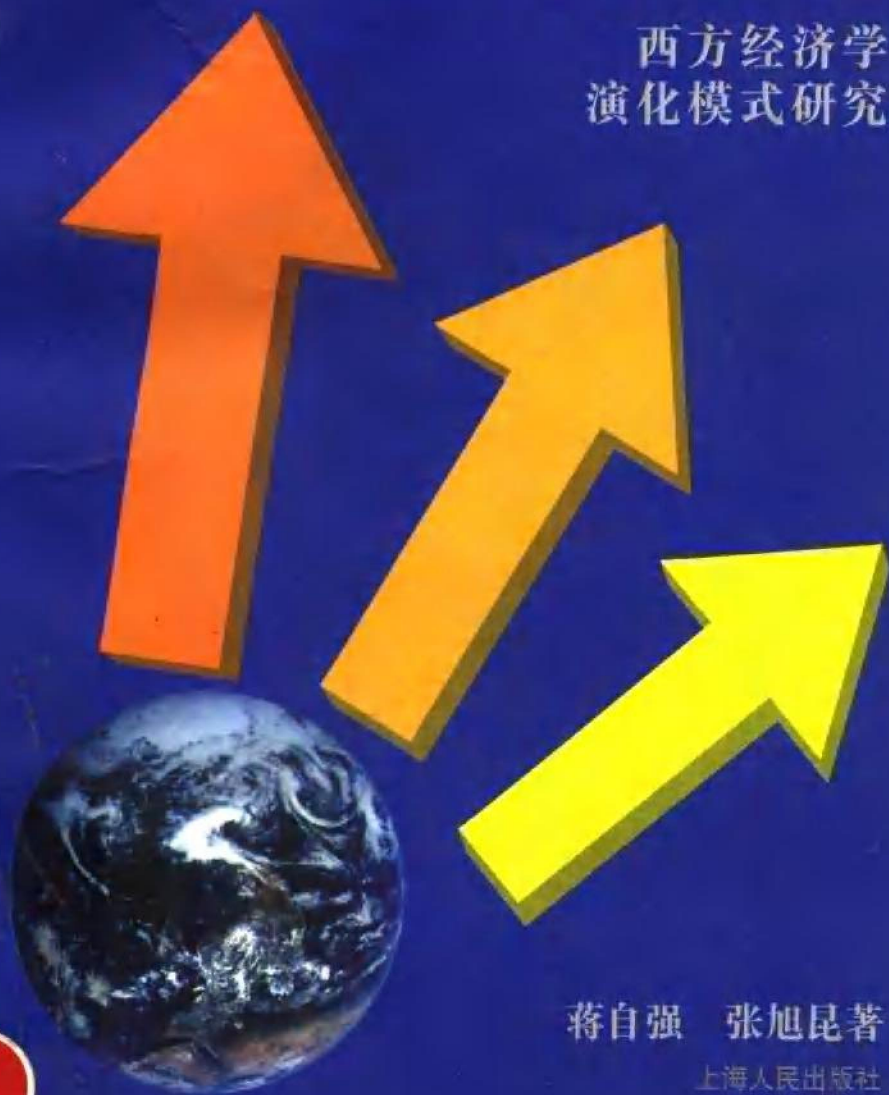


三次革命和 三次综合

西方经济学
演化模式研究



蒋自强 张旭昆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

——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

蒋自强 张旭昆 著

上海 人民出版社

465654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徐永禄

特约编辑 黄明辉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

——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

蒋自强 张旭昆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联合科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9.5 插页 2 字数 472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2189-9/F·479

定价:28.70 元

序

陈岱孙

蒋自强同志治经济学史多年，曾主编过《简明西方经济学史》，于1989年出版发行。最近，自强同志复和张旭昆同志合作撰著《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一书。书成将以付梓，来求序。

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本书试图以西方经济思想，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的内容为线索，论述从重商主义迄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主流学派思想的发展。

当然，“革命”和“综合”都是从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引借的名辞或提法。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公认为对当时正统经济思想进行“革命”的只有两次。第一次指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所谓“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另一次则指出现于本世纪30年代的所谓“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但除了这两次公认的“革命”之外，“革命”一辞的应用并不严格。例如，有人提出了“张伯伦革命”(Chamberlinian Revolution)一辞，认为张伯伦的垄断竞争学说，在物价理论上，一举推翻了完全竞争作为市场规范的神话。如同凯恩斯在近代经济学发展中确立新型的宏观分析所起的革命一样，张伯伦(Chamberlin)的学说在微观经济学发展中也是一次革命。又如，有人提出了“斯拉法革命”(Sraffian Revolution)一辞，认为斯拉法(Sraffa)对商品生产的价格分析的重要性不亚于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也许因为赞成者不多，这两个“革命”推崇的

倡导没有成为气候,但其呼声也还是得到一些人的反应。至于得到公认的“综合”也只有两次。一次指的是,19世纪40年代的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另一次指的则是,19世纪90年代问世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本书引借了这两个名辞或提法,在两次公认的基础上,提出了应该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反对重商主义的斗争作为经济学发展历史上第一次革命,于是“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就成为第二次及第三次革命;又提出了,在凯恩斯反第二次综合的新古典学派革命之后的当代,存在着第三次综合,至少,有一个虽然不算完全成功的第三次综合的尝试。

名辞的引借,就有产生以辞害意的可能。以“革命”一辞而论,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所称的“革命”,实际上,只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经济思想内部派系的争论。它只是,在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时期,在处于统治地位经济思想内部,被动地出现的一个自发的知识的发展。其目的并不在于在意识形态上推翻现存的思想体系,而实只在于修正、改进、完善在现存思想体系中,已不适应新社会要求的某些理论。以“边际革命”为例,边际的概念和效用作为价值规定性的思想早已存在了。但在上一世纪的70年代,二者结合起来却居然成为对旧思想的“革命”。其关键在于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以古典派的劳动价值论为对立面的。作为古典经济学一个主要原理的劳动价值论,到了19世纪的初期,已经不适于当世的要求。约翰·穆勒作为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派学说的综合者,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实已放弃了这一学说;而他在60年代,对工资基金学说的放弃更加甚了对古典学派这一理论的不信任。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等人并不企图全面推翻古典学派的体系,而只是在价值问题上,企图以效用价值论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久已失去作用的劳动价值论而已。“综合”的含义亦复如此。再以约翰·穆勒为例。虽然马克思说穆勒在其《原理》中,力图调和“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个“不能调和的

东西”(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但西方经济学者所认为穆勒的“综合”,并不包括“无产阶级的要求”,而只是指其调和自李嘉图以次,同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不同流派各正反意见,融汇之于一体的努力。所以“革命”也好,“综合”也好,都只是当时已成为社会统治思想的统治阶级经济思想的内部争论与融合而已。本书对这两辞的引用和论证,也应在这意义上来理解。

认为在“凯恩斯革命”之后的半世纪中酝酿着的第三次综合是本书另一个创见。在凯恩斯之后,尤其是在最近的三四十年,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派系纷繁、论战剧烈、似乎空前学术繁荣的局面。但究其实况,却大都和凯恩斯有关;或以对凯恩斯的思想作进一步补充、发展为目的,或以凯恩斯的某些论点为立异、反对的出发点。这就是为什么,一位应该属于反凯恩斯派系的某西方经济学界一健者,曾不无慨叹地说,“在某一意义上,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这也就是本书最后一部分,关于第三次综合所涉及的内容。作者着意地说明,虽然这第三次综合还处于尝试阶段,但鉴于过去数百年来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经验,这第三次综合是一个不可免的趋势。也许这趋势的实现有待于一个能“领一代风骚”的新“才人”的出现;但出现终会成为事实。当然,这一次的综合也必然仍是统治思想内部各正反观点暂统于一尊的局面。

作者借用“革命”和“综合”这两个名辞或提法,作为线索贯串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历程,着重地揭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这几百年中所出现的这反、合两趋势,相互对抗又相互融合的发展的规律性。但在述及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流派、人物时,又不慳笔墨,详加论述并提出自己的创见。所以,虽然在性质上,本书是一本专题著作,而实际上,它又是一本很好的经济学说史教材。它的出版是我们经济学史界所欢迎的。

1991年1月25日

前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关于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自解放开始,直到“文革”结束;第二阶段则大约自“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开始,直到今天。

在第一阶段中,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帮助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人了解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诞生的学术背景,帮助他们加深对经典经济著作和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因此,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为马克思、列宁等人所肯定的古典经济学家和所否定的庸俗经济学家,而对于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又主要研究其中的价值论、分配论等主要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同时,对这些经济学家,除了马克思、列宁等人明确肯定的人和论点之外,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作为研究成果的专著,主要内容是先按时间顺序,再按门派分野,逐个批判式地介绍西方经济学家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学说。

在第二阶段中,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的目的开始有了变化,除继续保留第一阶段的目的之外,开始强调从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中吸取有益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合理成份。因此,研究的对象比第一阶段扩大了,边际革命以后,尤其是凯恩斯革命以后的西方经济学说,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对于西方经济学家的思想,除了继续研究价值论、分配论等领域外,对诸如宏观经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等领域,也越来越重视。同时,对于西方经济学家,尤其是对于李嘉图、西斯蒙第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开始改变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转变为总体否定,部分肯定,即

一方面强调他们的理论在总的体系上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也承认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是有价值的,可作为我们四化建设的借鉴。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从内容上看,突破了那种以时间为序,以流派、人物为线索的批判性介绍的模式,开始出现两个新的特征:一是可称之为“淘金式”的研究,即主要是从以往西方经济学家的论著中搜寻对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有用的论点。这类研究的成果,大多以论文形式出现;二是可称之为“专题式”的研究,即或者以某个或几个专题为主线,分别按时序介绍各西方经济学家对该专题的发展和贡献,或者以某个或几个流派为主线,介绍它或它们的发展演化。这类研究的成果大多以专著形式出现。

“淘金式”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对弹性理论的研究能很快应用到实际经济工作中去。但对于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的“专题式”研究,其意义似乎一时难以捉摸。我们认为,对发展过程的研究,最终是为了了解那些对我们今天有用的西方经济理论,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我们不仅要深入了解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曾经出现过哪些对我们今天有用的理论,更要了解这些理论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并发展的;以便在今天也尽可能地创造类似的条件,以促使对今天甚至对今后有用的新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化的专著,它所注重的并非告诉读者在某某人、某某著作中,有某些对我们今天有用的论点,而是力图阐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演化模式。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演化,可以从两个层次去研究:一是研究某个经济学家的思想演变过程;二是研究经济思想主流的演变过程。本书以第一层次的分析为主,辅之以一定的第二层次的分析。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演化,又可从两个侧面去研究:一是研究发展演化的原因,可称作原因分析;二是研究发展演化的过程,可称

作过程分析。本书以过程分析为主,辅之以一定的原因分析,由于正文中对原因的分析较为单薄,故下面将概括地介绍一下我们对原因的看法。

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化的原因,需从三个方面去寻找:一是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二是以往积累的经济理论;三是其它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乃至一般文化背景,简称一般的科学——文化背景。

上述三个方面促进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化的机制是有所不同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需要把经济理论分解为两个侧面:

经济理论的一个侧面是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们往往是在许多现实问题的刺激下考虑经济理论的。李嘉图关心的是谷价问题、通货问题以及收入分配问题。马歇尔关心的是贫困是否必然的问题。凯恩斯关心的是失业问题,等等。可以把这一个侧面称作“问题”面。需要说明的是,一个经济学家在一生中或一生中的某一时期,往往并不会只面临一个“问题”,而是面对一个“问题”集合。在这个集合中,他关注哪些问题,是可以选择的。

经济理论的另一个侧面是经济学家们分析“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或如熊彼特所说的分析技术。可以把这个侧面称作“技术”面。这里必须对“技术”这一概念作广义的理解,它包括经济学家们分析“问题”时所采纳的特定角度,所使用的概念,所设定的假设系统(包括明确提出的假设和暗含的假设),推理的形式(归纳的或演绎的、文字的或数理的),等等。经济学家们往往是运用特定的“技术”去分析所关注的问题,每个经济学家可以说都拥有一个由概念系统,假设系统,推理形式及特定角度所组合而成的“工具箱”,这就是他分析现实问题的“技术”。

经济理论的“问题”面和“技术”面并不能截然分开,对任何“问题”的分析势必要运用一定的“技术”,而任何“技术”也只有在对某个(些)问题的分析中才能表现出来。但对于分析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化的原因这一目的来说,把这两个侧面加以区别有助于说明问

题。

经济理论的“问题”面无所谓进步与否,只有适时不适时之分。一种经济理论所关注的“问题”若正好是重大现实问题,那它便是适时的,否则便是不适时的。但这种适时不适时又是相对的,随着现实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原来适时的理论可能变得不适时,而原来不适时的理论倒可能变得适时了。

经济理论的“技术”面恰如熊彼特所说,是有进步性质的。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对同一个“问题”采用更好的技术去分析。但这种进步也只能在某种相对的意义理解。设有 A、B 两种分析“技术”,另有甲、乙两个“问题”,很可能对于甲“问题”来说,采用 A“技术”来分析比 B“技术”更好;但对于乙“问题”来说,则是 B“技术”更好。这就是说,各种“技术”的优劣比较,往往取决于所要关注的问题。

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主要决定着经济理论的“问题”面。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会造成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集合的变化,从而使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点发生变化,造成经济理论中“问题”面的演变。处于大萧条时代的凯恩斯,主要关心的是失业,而处于 70 年代滞胀条件下的西方经济学家,关心的主要是滞胀。

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并不会直接导致经济理论中“技术”面的发展,但随着“问题”面的变化,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原有的“技术”可能显得笨拙,于是便产生出对改进原有技术或创造新技术的需求,刺激经济学家们对“技术”面的创新冲动。这种创新冲动或发展“技术”面的需求,并不直接导致“技术”面的发展,要切实造成“技术”面的发展,还有待于以往积累的经济理论及一般的科学—文化背景方面的情况。

以往积累的经济理论,包括积累的“问题”和积累的“技术”。积累的问题往往起一种保守作用,使经济学家们持续把注意力停留在它们上面。这种保守作用在经济政治状况无重大变化时是有益的,它使经济学家们一代代地对这些问题作深入持久的思索,促使

他们不断努力,改进或创新分析技术。这就是说,它有助于稳定“问题”面,发展“技术”面。但在经济政治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这种保守作用便无益了。当滞胀现象迫切需要说明时,继续研究单纯的失业问题,就显然不合时宜了。

积累的“技术”构成一个大“工具箱”,它是经济理论的“技术”面不断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经济学家们利用这个“工具箱”,时而改进原有“技术”,时而创造出新“技术”。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但不是唯一地)决定着“技术”面的供给,促使“技术”面发展。

一般的科学—文化背景的状况及其发展,既影响到经济理论的“问题”面,又影响到“技术”面。经济学家们总是在一定的科学—文化背景的制约下意识到各种现实问题的。没有对劳动群众的贫困感到不满这样一种价值观念,马歇尔就不会把“贫困是否是必然的”这一问题作为他研究经济学的动机。没有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不一定会在70年代开始感到经济增长是否必要这个问题。可以说,现实的经济政治状况本身并不会提出问题,能够从现实状况中发现或意识到什么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文化背景。现实状况决定了经济学家们可能意识到的问题的一个范围,随着现实状况的变化,这个范围也随之变化。但在这个范围中哪些问题中选,则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文化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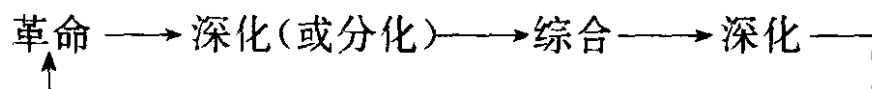
至于一般的科学—文化背景影响到经济理论“技术”面的例子,简直俯拾皆是。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和“经济人”假设,显然是英国传统的功利主义哲学和当时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显然受到德国法学界历史法学派的影响。边际主义思潮的三位奠基人中间起码有两个人受到数学的影响。马歇尔从力学中引进均衡观念,从生物学引进连续原理,凯恩斯作为一个概率论专家,引进了不确定性概念,等等。甚至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即几乎所有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都是在经济学以外的学科中有一定成就或一定造诣的人,都善于从其它

学科中吸取有用的概念和推理技巧用于经济学。所以说,科学—文化背景是经济理论“技术”面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源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技术”的供给。

人们习惯于分门别类地研究人类思想发展的各个侧面,如分别建立了哲学史、政治学说史、经济学说史、物理学史、数学史等等……。这就忽略了这些不同类别的学说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所以也就无法真正说明某种学说(包括经济学)的发展原因。

经济学的发展演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及一般的科学—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所以只有通过这种相互作用的分析,才能真正了解经济学发展演化的原因。但是,把经济理论作为整个社会中一个开放的子系统,从它与其它系统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经济理论的发展,本书尚无法胜任这一工作,仍然只能主要着笔于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演化过程的描述和概括,大量略去社会的其它子系统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化的影响。我们在《前言》中之所以说明这一点,是为了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不至于产生错觉,误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作为一种封闭系统发展的。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化的过程进行描述。但这一描述的新颖之处在于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化的过程进行了概括,提出了关于发展演化过程的模式,它可以图示如下:



本书按照这一模式描述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化的过程。这里必须对“革命”和“综合”这两个词作一解说,这里所谓的“革命”,并不是指社会革命,而是指学科领域中的革命;具体说来,它是指西方经济学中的“革命”,即指西方经济学发展演进到某阶段时所发生的经济理论或(和)政策主张的重大转变。它或者是提出一套新理论(政策),或者是创立一个新学派,统领一代风骚。这里所谓的“综

合”，是学术思想的综合；具体说来，它是指西方经济学演进到某一阶段，综合多种经济理论观点形成一个兼包并蓄的体系。这种综合性体系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往往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一般都溯源至重商主义。在其发展演变的近 500 年中，曾经历了三次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或称三次重大转变）和三次大综合。

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化过程中的第一次革命，是 17 世纪下半期至 18 世纪下半期由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所进行的批判重商主义的革命。这次革命既包括理论也包括政策、既包括“问题”面也包括“技术”面。这次革命以 1776 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主要标志。通过这次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许多都是由古典经济学家提出来的，而且，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自亚当·斯密以后，随着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促成了亚当·斯密体系的大分化，使西方经济学向着不同方向发展演化，形成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或流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李嘉图、西斯蒙第、马尔萨斯、萨伊、李斯特等人。到 19 世纪中叶，约·斯·穆勒综合了当时各种不同派别的经济观点，建立了一个折衷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化过程中的第一次综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约·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被认为是当时西方经济学“正统观念”的代表作，他的折衷主义经济理论，成为当时西方经济学的“正宗”。

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化过程中的第二次革命是边际革命。这次革命的重点在于理论而非政策，在于“技术”面而非“问题”面。它对西方经济学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革命由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三人分别发起，而在英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和美国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本书认为，导致边际主义思潮迅速蔓延的

社会基础并不是食利者阶层的发展,也不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形成,而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崛起。中产阶级一方面对西方社会中贫富不均、垄断等现象不满,另一方面又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的批判。因此,既肯定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竞争,又否定贫富不均和垄断的边际主义理论,便很容易得到他们的欢心。

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化中的第二次综合,是由马歇尔和威克塞尔两个人完成的。前者在微观领域综合了古典学派和边际学派的价值论、分配论,建立了局部均衡的价格论。后者虽然在微观领域也以一般均衡为前提对古典学派和边际学派的价值论、分配论进行了综合,但更重要的是在宏观领域中,通过综合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与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建立了累积过程理论。这两个人分别成为剑桥学派和北欧学派的开山始祖。这两个学派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深化了第二次综合。通过第二次综合所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虽然理论分析的重点是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价值决定、收入分配及一般物价水平的决定问题,但在政策主张上,并不是无条件主张自由竞争,而是通过分析指出自由竞争并不一定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此主张由国家干预收入分配,干预货币发行。

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化中的第三次革命,就是凯恩斯革命。这场革命既是理论上的又是政策上的,既涉及“问题”面,也涉及“技术”面,所以它的影响极为深远。但这场革命对于北欧学派来说是不存在的,北欧学派通过发展威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得到了与凯恩斯大致相同的理论见解和几乎完全一致的政策主张;同时,也不能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仅仅由凯恩斯一人所进行的,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罗莎·卢森堡的影响下,独立创立了一套与凯恩斯大致相同的理论,但语言壁垒使得凯恩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独占鳌头。与北欧学派相比,凯恩斯取得更大影响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传统理论尤其是萨伊定律采取了挑战的态度,这便迎合了当时年轻一代经济学家面临大萧条的局面而产生的对

传统理论的怀疑态度。北欧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虽然蕴含着同样的挑战,但威克塞尔对萨伊定律的态度摇摆不定,缪尔达尔、林达尔等人也并未直接否定萨伊定律,所以北欧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便不具有革命的外观。凯恩斯在政策方面的革命不在于倡导国家干预,这同样是马歇尔和威克塞尔体系蕴含的政策主张,他在政策方面的革命在于更动了国家干预的目的,从收入再分配、币值稳定转变为消除非自愿失业;在于更动了干预的主要手段,从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变为以财政政策为主。

凯恩斯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从宏观和微观两条线索展开。在宏观方面,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者对凯恩斯体系的各种进一步修订发展,对消费理论、投资理论、增长理论、波动理论、货币理论及通货膨胀理论的深入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主义者分裂为英国的新剑桥学派和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另一方面是反对凯恩斯的经济学家发展出了货币主义宏观理论、理性预期、供给学派等等。在微观方面,一方面是一般均衡理论的精致化,实用化,如迪布鲁、阿罗对均衡的证明,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等等。另一方面则是斯拉法所引起的新李嘉图主义的出现。

战后,西方经济学家中不乏打算进行新的综合的人,这一阶段综合的主要任务是设法把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希克斯、萨缪尔逊等人的目标是把改善的凯恩斯宏观理论与新古典的微观理论结合在一起。新剑桥学派则认为应当以抛弃新古典的价值论、分配论为基础进行新的综合。非均衡学派则主张通过非均衡分析改造微观理论,并从非均衡的观点出发重新解释凯恩斯革命,然后在此基础上沟通微观与宏观的关系。迄今为止,尚未有哪一家的综合为西方经济学界所公认。故第三次综合并不像第一次和第二次综合那样定形,它还在不断变化中。

鉴于上述看法,我们将本书分成三篇进行阐述,第一篇论及第一次革命和第一次综合,第二篇是第二次革命和第二次综合,第三

篇则是第三次革命和第三次综合。对于发起革命和进行综合的经济学家们的思想理论，我们都着重全面介绍，对那些深化革命和深化综合的经济学家，也尽量讲清他们作出的新贡献。在介绍哪些人哪些理论这一问题上，选择的基本原则是紧紧围绕“革命——综合”这一条主线，对于偏离该主线的流派、人物及理论，在必要时才在次要的地位论及。例如，对于历史学派，本书只是在边际革命的背景中稍涉及新历史学派；再例如，对于熊彼特，只介绍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略去他关于经济制度演化的理论；对于通常的专著中少见的人物，我们都尽量加以论述，如专节介绍意大利的巴罗尼、瑞典的卡塞尔以及美国的费雪等人；对于通常专著都论述的人物，有些我们尽量阐述得更详细些，如瓦尔拉斯，通常只论述他一般均衡理论的一小部分，本书则较详细论述他理论的全貌；又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一般只论述他们的价值论、分配论，本书则增加论述了他们的发展思想等。对有些人我们则尽量论述得简炼，如对于马歇尔。当然，基本的原则始终是围绕“革命——综合”这一主线。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有不少流派和人物都只能极为简略地论及，或干脆暂付缺如。若将来掌握了新的资料，本书又有再版机会，将尽力补上。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陈岱孙教授的关怀和帮助，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曾多次来信提出指导性意见，并热情为本书作《序》。在此，我们向陈岱孙教授表示深深的感谢。此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徐永禄先生、宁波大学石土钧先生以及杭州大学史晋川、金祥荣诸位先生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我们的能力限制，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难免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恳请各位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我们将非常感谢。

1990年12月28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篇 西方最早流行的经济思潮及其演进中的 第一次革命和第一次综合(15 世纪— 19 世纪 60 年代)	
第一章 西方最早流行的经济思潮——重商主义.....	(1)
第一节 重商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1)
第二节 重商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及其发展的历史 阶段.....	(3)
第三节 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理论 观点.....	(6)
意大利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 安东尼奥·塞拉.....	(6)
英国早期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 约翰·黑尔斯.....	(9)
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最著名代表—— 托马斯·孟	(11)
法国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 蒙克来田和柯尔培尔	(13)
德国和奥地利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 霍尼克	(16)
重商主义衰落时期的代表人物—— 斯图亚特	(19)